

# 夫妻互动类型异同及其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对新冠肺炎疫情后婚姻干预的启示\*

琚晓燕<sup>1</sup> 李晓敏<sup>2</sup> 兰菁<sup>3</sup> 方晓义<sup>\*\*4</sup>

(<sup>1</sup>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 北京, 100089) (<sup>2</sup> Department of Family Studies and Human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Arizona, Tucson, 85719)

(<sup>3</sup> The Family Institute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vanston, 60201) (<sup>4</sup>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采用实验室观察法, 对 106 对夫妻在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任务中的互动行为进行录像并编码, 探索丈夫和妻子互动类型的异同及其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旨在为新冠肺炎疫情后婚姻干预提供建议。研究发现: (1) 丈夫和妻子的互动类型呈现跨情境上“量”的变化, 跨性别上“质”的差异。(2) “温暖支持型”和“敌意-退缩型”的丈夫和妻子, 自己及配偶的婚姻质量都分别稳定地居于最好和最差的一组。在问题解决情境中, “传统内敛型”、“微敌意型”的丈夫, 与“温暖支持型”一样, 其妻子婚姻质量都处于最好的一组; 但“微敌意型”的妻子, 其丈夫婚姻质量处于最差的一组; “理智型”和“激烈型”的妻子, 其丈夫婚姻质量得分都处于较高的一组。研究根据以上结果对新冠肺炎疫情后婚姻干预的“关键互动模式”“关键领域”“关键对象”提出建议。

**关键词** 互动类型 婚姻质量 婚姻干预 新冠肺炎疫情

## 1 问题提出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家庭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大灾难对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Cohan 和 Cole (2002) 的追踪研究发现, 多个受飓风灾难影响地区的结婚率和出生率显著上升, 而离婚率也显著上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影响了婚姻关系的质量。蔺秀云团队的研究发现 (2020), 与新冠肺炎疫情前相比, 疫情期间夫妻的积极互动和消极互动都明显增多, 更多妻子认为消极互动增加的更多。易感-压力-适应模型认为, 夫妻互动技能是影响婚姻关系最近端的变量 (Bradbury & Karney, 2010)。在疫情后对夫妻互动技能进行干预, 有助于灾后家庭关系的修复, 预防离婚, 促进家庭和社会稳定。然而, 疫情后的婚姻干预还有三个问题需进一步明晰: 第一, 夫妻互动最重要的两种情境, 即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

(指伴侣在压力情境下如何相互支持) (Pasch & Bradbury, 1998), 哪种情境中的互动技能对婚姻质量更有影响力? 第二, 什么样的互动模式对婚姻结果更具有破坏力, 什么样的互动模式对婚姻有积极影响? 第三, 丈夫和妻子谁的互动技能对婚姻满意度更具有影响力? 回答以上关于婚姻干预“关键情境”“关键互动模式”“关键对象”的问题, 将能为婚姻干预提供实证证据, 以便实践者更有针对性的设计新冠肺炎疫情后婚姻干预方案。

关于“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 哪种情境的互动技能对婚姻质量更有影响力? 早期的婚姻研究受到社会学习理论的影响, 都倾向于认为“婚姻的痛苦来源于夫妻无效的冲突解决方式” (Gottman, Coan, Carrere, & Swanson, 1998)。有些研究支持了“亲密进程理论” (Sullivan, Pasch, Johnson, & Bradbury, 2010)。他们发现, 比起问题解决能力来说, 夫妻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5BSH092) 的资助。

\*\* 通讯作者: 方晓义。E-mail: fangxy@bnu.edu.cn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200431

能否在对方表达个人困难和脆弱情绪时给予支持的能力是婚姻变化的一个起始环节。可以看出,关于夫妻互动干预的“关键情境”(问题解决还是社会支持),研究未得出一致结论。

关于夫妻互动技能对婚姻质量或婚姻结果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研究是探索夫妻的某一种具体行为对婚姻的影响。例如 Gottman(1994)报告了婚姻的“四大预警”行为:指责、防御、轻视、石墙行为;Williamson等(2012)以及刘宣文、琚晓燕、唐水玲和方晓义(2015)的研究发现,夫妻的消极行为(如敌意、控制等)能显著预测丈夫的婚姻质量。还有一类研究是对夫妻双方的互动行为进行匹配,并探讨不同类型夫妻婚姻质量的差异。例如:Gottman(1993)把夫妻分为激烈型、温暖型、回避型、敌意型、敌意/分离型。其中,前3类夫妻称之为“冲突管理型夫妻”,他们的婚姻都会比较稳定;后2类夫妻称之为“非冲突管理型夫妻”,他们的婚姻是不稳定的。中国学者Cao等(2015)区分出三种夫妻互动类型:传统内敛型、吵架型、温暖支持型。温暖支持型夫妻的婚姻满意度最高,其次是传统内敛型夫妻,最后是吵架型的夫妻。

这两类研究,第一类研究只考虑了某个具体行为对婚姻的影响,没有从整体上考虑互动中积极行为对消极行为的平衡作用。夫妻现实的日常互动中,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是相互渗透的。第二类研究同时考虑积极和消极行为的交互影响,把丈夫和妻子的数据进行匹配,再做类型学研究。然而,丈夫和妻子的互动特征并不总是匹配的。有研究提示,男性和女性在处理冲突,或者向伴侣提供支持方面存在差异(琚晓燕,方晓义,李晓敏,2016;Neff & Karney, 2005)。总结起来,妻子比丈夫更主动的解决冲突,同时也具有更好的为对方提供支持的能力。因此,对丈夫和妻子的互动类型分别进行研究,探讨夫妻互动类型对婚姻质量影响的性别差异,可以确定“关键的干预对象”与“关键互动模式”。

观察研究无疑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考察夫妻互动技能的方法,同时也能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因此,本研究采用“问题解决”(Gottman, 1979)和“社会支持”(Curtrona, 1996)观察研究范式,旨在创设两种谈话的情境,对夫妻在两个任务中的互动进行录像并编码(此为已有数据);运用潜在类别分析法,对丈夫和妻子的互动类型分别进行提炼,并探索其对婚姻质量的主客体效应。

## 2 研究方法

###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式,通过网络宣传、社区招募、熟人介绍等方式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被试。确认愿意参与研究的有效被试为106对。夫妻的婚龄为 $15.13 \pm 11.20$ 月(1~36月之间);丈夫的年龄为 $29.62 \pm 3.37$ (23~43岁之间),妻子的年龄为 $28.00 \pm 2.26$ (22~36岁之间);丈夫月收入为 $10223.32 \pm 7658.05$ 元,妻子的月收入为 $6611.54 \pm 4725.60$ 元。学历情况的百分比如下:妻子是初中学历的占0.9%;高中学历的丈夫占1.9%,妻子占2.8%,大专学历的丈夫占11.3%,妻子占4.7%;本科学历的丈夫占36.8%,妻子占36.8%;研究生及其以上学历的丈夫占50%,妻子占52.8%(有两名被试的学历不详)。其中,丈夫的年龄( $t=5.641, p<.001$ )与月收入( $t=5.648, p<.001$ )都显著大于妻子;两者的受教育年限没有显著差异。

### 2.2 研究程序

观察研究参考Gottman(1979)、Pasch和Bradbury(1998)的实验程序。主试邀请夫妻到实验室参与研究,先与夫妻签署知情同意书,之后独立完成问卷,最后再一起完成两个谈话任务并被录制。在“问题解决”任务中,邀请夫妻双方各选一个自己认为婚姻中需要解决的冲突,尽量找到解决办法,讨论10分钟,顺序随机。在“社会支持”任务中,邀请夫妻双方各选一个自己遇到的困难,或者对自己不满意想要改变或提升的方面来讨论,且这个话题没有引发过夫妻冲突(为了和问题解决情境互斥)。要求夫妻以平常的方式进行回应,时间10分钟。实验结束后夫妻一共获得150元的报酬作为回报。

### 2.3 研究工具

#### 2.3.1 夫妻互动行为编码系统

编码体系采用经中国适应性修订的Iowa Family Interaction Rating Scales(简称IFIRS)(琚晓燕,2013),对夫妻互动中出现的13种行为进行编码。在编码工作正式开始之前,编码人员参加了每周10小时(包括2小时的手册阅读,4小时的培训讲解,4小时的课后练习)、历时3个月的培训,并在最终标准录像测试中达到78%的正确率。

编码人员对每个任务观看2~3次,根据互动者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综合频率和强度给每个行为赋分。13种行为分别为:肢体情感、温暖支持、幽

表 1 IFIRS 各行行为的编码一致性信度 (ICC)

	回避	否认	控制	敌意	质问	心理攻击	抱怨	有效沟通	倾听反应	问题解决	肢体情感	幽默玩笑	温暖支持
丈夫	.72	.73	.77	.84	.74	.82	.60	.72	.75	.68	.91	.79	.70
妻子	.88	.71	.67	.86	.84	.78	.71	.82	.78	.81	.88	.66	.61

默玩笑、敌意、质问、控制、否认、抱怨、心理攻击、有效沟通、倾听反应、回避（反向）、问题解决。因话题提出人不是本研究感兴趣的变量，故把同一个任务不同话题提出人的两个编码得分进行平均，方便计算。

为评估一致性信度，编码人员对前 20% 的录像进行独立编码以确认评分一致性，并计算 ICC 作为指标（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McGraw & Wong, 1996）。本研究中丈夫和妻子在两个情境各行行为的 ICC 平均分在 .60~.91 之间，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 2.3.2 婚姻质量

采用 Norton 在 1983 年编制的婚姻质量量表（Quality Marriage Index），用来测量被试对婚姻关系的总体评价。该量表共 6 个条目，前 5 题采用 7 点计分，最后一题采用 10 点计分。6 个条目的总分越高，表明婚姻质量越高。在本研究中，丈夫和妻子婚姻质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93 和 .94。

### 2.4 数据整理和分析

采用 SPSS 20.0、Mplus 7.0 进行数据分析处理。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法提取丈夫和妻子的互动类型，采用 One-way ANOVA 检验互动类型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 3 结果

### 3.1 夫妻互动模式的潜在类别分析

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法探索丈夫和妻子的互动类型（张洁婷，焦璨，张敏强，2010）。首先把丈夫问题解决情境中的 13 种编码同时放入模型中进行估计。以单类别基线模型为起点，每次增加 1 个类别，探索能够充分解释互动行为观测指标之间关系的最小潜类别数。从第 6 类开始，BIC 和 AIC 的值开始变大。因此 4 类和 5 类是比较合适的分类范围。在 5 类中，有被试数少于 5 的类别，没有实际意义。研究认为 4 类别模型是能够充分解释各观测指标之间关系的最简单模型。

其次针对其他三个情境的编码也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均发现 4 类别模型是能够充分解释各观测指标关系的最简单模型。表 2 中列出了 4 类别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情况。每个类别在各个行为上的平均得分剖面图分别见图 1、2、3、4。

根据每个潜类别在各个观测变量上的特点命名。首先是对丈夫在问题解决情境中的互动类型进行命名。从图 1 可以看出，第一类（以右侧小图标为顺序，下同）丈夫的消极和积极情绪表达都较少，命名为“传统内敛型”。第二类丈夫消极行为和情绪很少，积极的卷入谈话，并表达温暖支持，命名为“温暖支持型”。第三类丈夫积极情绪表达较少，在敌意等消极行为上得分略高，命名为“微敌意型”。第

表 2 四种情境潜类别分析结果

互动模式	潜类别数	Log (L)	AIC	BIC	df
丈夫问题解决模式	1	-2402.210	4856.420	4843.526	26
	2	-2277.605	4635.209	4615.372	40
	3	-2199.115	4506.230	4479.450	54
	4	-2159.332	4454.664	4420.941	68
妻子问题解决模式	1	-2505.763	5063.527	5050.633	26
	2	-2344.001	4768.003	4748.166	40
	3	-2296.398	4700.795	4674.015	54
	4	-2255.176	4646.353	4612.630	68
丈夫社会支持模式	1	-2096.786	4245.573	4232.679	26
	2	-1985.942	4051.883	4032.046	40
	3	-1924.810	3957.620	3930.840	54
	4	-1889.223	3914.445	3880.723	68
妻子社会支持模式	1	-2280.833	4613.666	4600.772	26
	2	-2156.054	4392.109	4372.272	40
	3	-2099.042	4306.085	4279.305	54
	4	-2051.757	4239.514	4205.791	68



四类丈夫在消极行为上得分最高,而在积极情绪上得分最低,回避得分也最高,命名为“敌意-退缩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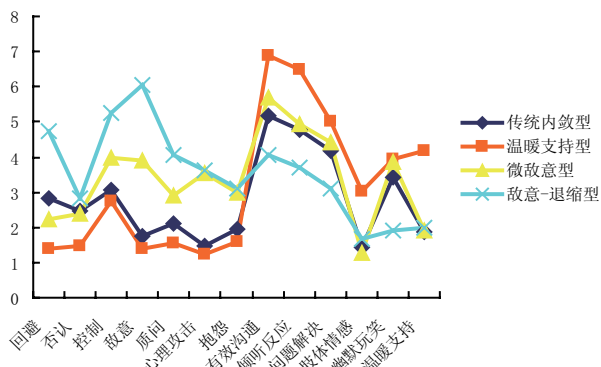


图1 丈夫问题解决模式各类别每个行为平均得分剖面图

其次,为丈夫在社会支持情境中的互动类别命名。此情境中各观测变量上的变化特点与“问题解决”情境较类似,故对四类丈夫命名为“传统内敛型”、“温暖支持型”、“微敌意型”、“敌意-退缩型”(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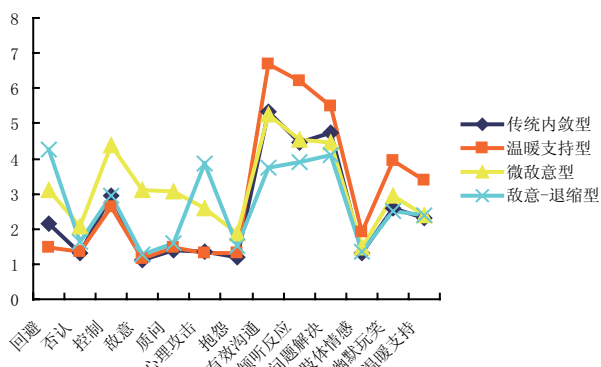


图2 丈夫社会支持模式各类别每个行为平均得分剖面图

再次,为妻子问题解决互动类型命名(见图3)。可以看出,第一类妻子同时表达激烈的消极及积极行为和情绪,命名为“激烈型”。第二类妻子能够理智的分析解决问题,积极情感及消极情感表达较少,命名为“理智型”。第三、第四类妻子分别命名为“微敌意型”和“敌意-退缩型”,与丈夫此

类型的意义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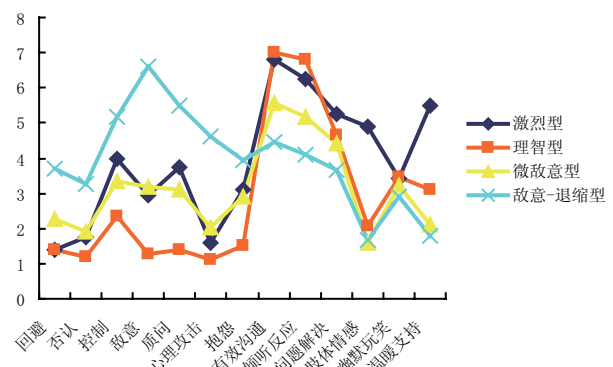


图3 妻子问题解决模式各类别每个行为平均得分剖面图

最后,对妻子在社会支持情境中的互动类型进行命名。从图4中可以看出,有三类妻子的特点与“问题解决”情境类似,分别为理智型、微敌意型和敌意-退缩型。另一类妻子在消极行为上得分低,在积极卷入和积极情感上得分都很高,命名为“温暖支持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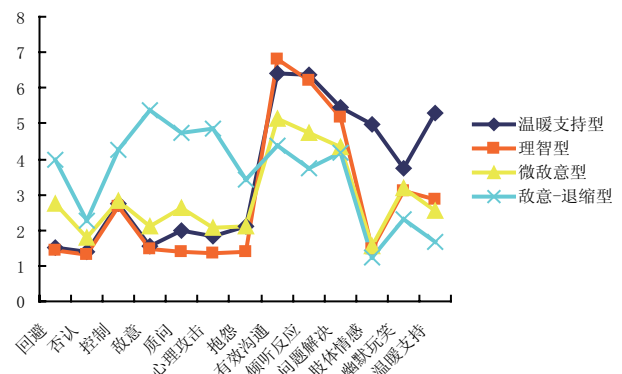


图4 妻子社会支持模式各类别每个行为平均得分剖面图

从比例上看,在问题解决情境,“传统内敛型”的丈夫最多(44.34%),“微敌意型”的妻子最多(46.23%);在社会支持情境,温暖支持型的丈夫最多(47.17%);而“理智型”的妻子最多(48.11%)。

### 3.2 不同互动类型的夫妻婚姻质量的差异分析

采用 One-way ANOVA 分析不同互动类型的夫妻婚姻质量的差异。结果如表3。

表3 不同类别的丈夫和妻子互动模式在婚姻质量上的差异分析

变异源	结果变量	SS	df	MS	F	$\eta^2$
丈夫问题解决模式	丈夫婚姻质量	826.08	3	275.36	9.072***	.212
丈夫问题解决模式	妻子婚姻质量	877.53	3	292.51	7.992***	.192
妻子问题解决模式	妻子婚姻质量	155.91	3	51.97	1.188	
妻子问题解决模式	丈夫婚姻质量	386.85	3	128.95	3.716*	.099
丈夫社会支持模式	丈夫婚姻质量	518.47	3	172.82	5.195**	.133
丈夫社会支持模式	妻子婚姻质量	137.75	3	45.92	1.046	
妻子社会支持模式	妻子婚姻质量	51.56	3	17.19	.384	
妻子社会支持模式	丈夫婚姻质量	81.96	3	27.32	.728	

从表中可以看出,问题解决情境中丈夫的互动类型对婚姻质量具有主体效应。事后检验发现:婚姻质量最高的是温暖支持型( $M=41.71, SD=3.92$ )和传统内敛型( $M=40.87, SD=3.31$ ),其次是微敌意型( $M=37.38, SD=8.22$ ),婚姻质量最差的是敌意-退缩型的丈夫( $M=32.92, SD=9.01$ )。

问题解决情境中丈夫的互动类型具有客体效应。事后检验发现:丈夫为温暖支持型( $M=39.41, SD=5.86$ )、传统内敛型( $M=39.25, SD=4.92$ )、微敌意型的妻子,其婚姻质量( $M=40.85, SD=5.16$ )都显著高于丈夫为敌意-退缩型的妻子的婚姻质量( $M=30.75, SD=10.52$ ),而前三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问题解决情境中妻子的互动类型具有客体效应。事后检验发现:妻子为温暖支持型( $M=41.95, SD=3.48$ )和激烈型( $M=43.25, SD=2.19$ ),其丈夫的婚姻质量更高,妻子为微敌意型( $M=38.26, SD=6.29$ )和敌意-退缩型( $M=38.25, SD=7.55$ ),其丈夫的婚姻质量更低。前两者以及后两者之间都无显著差异。

社会支持情境中丈夫的互动类型对婚姻质量具有主体效应。事后检验发现:温暖支持型的丈夫婚姻质量( $M=41.61, SD=3.27$ )显著高于传统内敛型的丈夫( $M=38.36, SD=6.02$ ),也显著高于敌意-退缩型的丈夫( $M=34.96, SD=8.90$ )。其他类型之间无显著差异。其他不同类型的互动没有引起婚姻质量的显著变异。

##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实验室观察法对夫妻的互动行为进行录像并编码,运用潜类别分析法提取丈夫和妻子的互动类型,并探讨互动类型对婚姻质量的主客体效应。结果发现:丈夫和妻子的互动类型在跨情境上存在“量”的差异,在跨性别上存在“质”的差异;“温暖支持型”和“敌意-回避型”的丈夫和妻子的婚姻质量,分别位列最好和最差的一组,其他几种互动类型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因性别及情境不同存在主客体效应上的差异。研究结果对于婚姻干预具有指导意义,具体分析如下。

### 4.1 丈夫和妻子互动类型的差异

本研究显示,互动类型跨情境的异同主要表现在所占比例的变化上,而互动类型本身相对稳定。互动类型跨性别差异似乎是“质”的区别。总结来看,丈夫和妻子在消极互动类型上比较一致,在两种情境中都有“微敌意型”、“敌意-退缩型”;在积

极互动类型上的分化较大。例如:有“传统内敛型”的丈夫,但没有此类型的妻子,与此相对应的是“理智型”的妻子,即妻子主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丈夫主要附和对方的谈话。有“激烈型”的妻子(积极与消极行为得分都较高),没有“激烈型”的丈夫,这些都说明女性在互动中比男性卷入更多。而且,在社会支持情境,“温暖支持型”的丈夫最多;而妻子是“理智型”的最多,这一点可能与本研究中妻子的学历较高有一定关系。综合起来,妻子比丈夫更主动、更投入,也有更多的控制和敌意行为;丈夫比妻子更内敛、回避、温和。有研究指出(Overall, Hammond, McNulty, & Finkel, 2016),夫妻互动中表现出的敌意行为与权力相关,处于权力弱势的一方,需要通过语言上的攻击来释放自己的影响力。关于中国夫妻的权力地位,夫权虽有所下降,但丈夫实权大于妻子实权的权力格局仍没有太大改变(李静雅, 2016)。也许妻子需要通过日常互动中语言“占上风”来取得一种权力上的平衡。

### 4.2 对新冠肺炎疫情后婚姻干预的启示

关于疫情后婚姻干预的“关键互动模式”,研究发现:“温暖支持型”的丈夫和妻子婚姻质量稳定的居于最好的一组。而在问题解决情境中,“传统内敛型”的丈夫与“温暖支持型”的丈夫,其妻子同属婚姻质量最好的一组;“理智型”和“激烈型”的妻子,其丈夫的婚姻质量都是最好的一组。这几种类型共同的特点是,他们都能积极的卷入对问题的讨论,并能提出解决方案。Gottman(1993)提出的“平衡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结果:消极行为并不可怕,只要同时伴随积极卷入和积极情感表达(如“激烈型”),就可以平衡指责、敌意等消极行为的影响。事实上,能够在冲突解决时持续的表达温暖支持的夫妻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夫妻会有争执和指责等行为。在灾后的婚姻干预临床工作中,结合中国的文化特点,实践者的工作重点可以是增加积极行为,而不一定非要引导夫妻减少或杜绝消极行为;可以是提升夫妻的理性分析问题、合作解决问题的技能,而不一定非要教夫妻如何表达温暖和赞美等。

本研究中发现的“敌意-退缩型”丈夫和妻子,自己和配偶的婚姻质量稳定居于最差的一组。这与Gottman(1993)、Busby(2009)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敌意”与“退缩”的叠加,是最具破坏力的互动模式。在灾后的临床干预中,需提早识别此类夫妻,对其进行婚姻治疗而不是婚姻教育,以预防关系的

恶化。另一方面,在婚姻干预和教育中,让夫妻了解,回避、退缩、防御的行为对婚姻的破坏力最大,应避免这类消极互动。

关于干预的关键对象,研究发现,丈夫和妻子相同的互动模式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是不一致的。例如,丈夫的“微敌意”互动类型并没有对妻子的婚姻质量产生负面的影响,而丈夫却对妻子的“微敌意”沟通模式比较敏感。这个结果与 Williamson 等(2012)以及 Schoebi, Wang, Ababkov 和 Perrez(2010)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比起妻子来,丈夫对对方的消极行为和情绪更敏感。同时,本研究发现,互动类型对丈夫婚姻质量有显著影响的路径有3条,而对妻子的影响只有1条路径显著;丈夫的互动类型对婚姻质量的主客体效应有3条路径显著,而妻子的互动类型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只有1条显著路径,提示丈夫婚姻质量更容易受到夫妻互动的影响,且丈夫的互动类型也更容易影响婚姻关系。这个结果启示,丈夫是更重要的干预对象。

关于婚姻干预的“关键领域”,研究发现,“问题解决”情境的互动技能更有影响力。比较起来,只有丈夫的社会支持情境中的互动类型具有主体效应,而问题解决情境中的互动模式对婚姻质量有显著影响的路径有3条。这提示我们,比起相互的情感支持,中国的夫妻似乎更看重对方是如何解决婚姻冲突的,这与 Sullivan 等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支持了“社会学习理论”。在临床干预中,应把重点干预领域放在解决夫妻冲突上。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婚姻干预的方案设计上,比起妻子来,丈夫为更重要的干预对象;比起相互的情感支持,帮助夫妻解决婚姻冲突更为重要;比起消除或减少争吵等消极行为,增加理性沟通、积极卷入更重要。本研究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被试的学历偏高,且都处于结婚3年内的新婚阶段,研究结果在推论到其他群体中要谨慎。未来可以设计追踪研究,以更充分的验证相关结论。

### 参考文献

- 嵇晓燕.(2013). 城市新婚夫妻互动行为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嵇晓燕, 方晓义, 李晓敏.(2016). 话题提出者、情境效应对夫妻互动行为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4(2), 327-331.
- 李静雅.(2016). 社会性别视角下夫妻权力影响因素比较研究——以福建省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例. *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 19(4), 81-90.
- 蔺秀云等.(2020).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多角色”家庭关系调研报告. <https://mp.weixin.qq.com/s/xP3YM5LRP57lb7J4lvTg0A>
- 刘宣文, 嵇晓燕, 唐水玲, 方晓义.(2015). 夫妻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依恋安全性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心理科学*, 38(1), 179-184.
- 张洁婷, 焦璨, 张敏强.(2010). 潜在类别分析技术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心理科学进展*, 18(12), 1991-1998.
- Bradbury, T. N., & Karney, B. R. (2010). *Intimate relationships*. New York, NY: Norton.
- Busby, D. M., Holman, T. B. (2009). Perceived Match or Mismatch on the Gottman Conflict Styles: Associations with Relationship Outcome Variables. *Family Process*, 48(4), 531-545.
- Cao, H., Fang, X., Fine, M. A., Ju, X., Lan, J., & Liu, X. (2015). Beyond the average marital communication: Latent profiles of the observed interactions among Chinese newlywed coupl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9, 850-862.
- Cohan, C. L., & Cole, S. W. (2002). Life course transitions and natural disaster: marriage, birth, and divorce following hurricane hugo.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6(1), 14-25.
- Cutrona, C. E. (1996). *Social support in couples: Marriage as a resource in times of stres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Gottman, J. M. (1979). *Marital interactio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 Gottman, J. M. (1993). The roles of conflict engagement, escalation, and avoidance in marital interaction: A longitudinal view of five types of coupl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1(1), 6-15.
- Gottman, J. M. (1994). *What predicts divor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processes and marital outcomes*. Hillsdale, NJ: Erlbaum.
- Gottman, J. M., Coan, J., Carrere, S., & Swanson, C. (1998). Predicting marital happiness and stability from newlywed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0, 5-22.
- McGraw, K. O., & Wong, S. P. (1996). Forming inferences about som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Psychological Methods*, 1(1), 30-46.
- Neff, L. A., & Karney, B. R. (2005). Gender Differences in Social Support: A Question of Skill or Responsiv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1), 79-90.
- Norton, R. (1983). Measuring marital quality: A critical look at the dependent variabl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5(1), 141-151.
- Overall, N. C., Hammond, M. D., McNulty, J. K., & Finkel, E. J. (2016). When power shapes interpersonal behavior: Low relationship power predicts men's aggressive responses to low situational pow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1, 195-217.
- Pasch, L. A., & Bradbury, T. N. (1998). Social support, conflic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ital dysfunct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6, 219-230.
- Sullivan, K. T., Pasch, L. A., Johnson, M. D., & Bradbury, T. N. (2010). Social support, problem solving, and the longitudinal course of newlywed marria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8, 631-644.
- Schoebi, D., Wang, Z., Ababkov, V., & Perrez, M. (2010). Affective interdependence in married couples' daily lives: Are ther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partner effects of anger? *Family Science*, 1, 83-92.
- Williamson, H. C., Ju, X., Bradbury, T. N., Karney, B. R., Fang, X., & Liu, X. (2012). Communication behavior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mong American and Chinese newlywed coupl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6, 308-315.



#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Observed Interaction Profile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mong Husbands and Wife: Implication to Marital Intervention after COVID-19 Epidemic

Ju Xiaoyan<sup>1</sup>, Li Xiaomin<sup>2</sup>, Lan Jing<sup>3</sup>, Fang Xiaoyi<sup>4</sup>

(<sup>1</sup>School of Social Work, China Youth University for Polit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9)

(<sup>2</sup>Department of Family Studies and Human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Arizona, Tucson, 85719)

(<sup>3</sup>The Family Institute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vanston, 60201)(<sup>4</sup>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COVID-19 epidemic affects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entire communities. Most research on post-disasters psychological reconstruction has focused on individuals' mental health outcomes, little attention focuses on relationship interven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interactive profiles among newlywed husband and wife 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se profiles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Thus, evidence-based suggestions can be provided for marital intervention after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identified 106 newly-weds community couples were invited to the university lab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Husbands and wives were asked to separately complete self-report measures. And then, partners were reunited for four 10-min videotaped discussions: two problem-solving interactions and two social support interactions. The Chinese version Iowa Family Interaction Rating Scale coding system was used to encode the couples' videotapes. 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reflecting inter-rater reliability were adequate in each interaction.

Latent class analysis consistently revealed 3 profiles of husbands and wives' interactive behaviors across contexts: warmly supportive profile, low Hostile profile, and hostile-withdrawn profile. However, as in the problem-solving context, husbands are more likely to show traditionally undemonstrative profile than wives, wives are more likely to show volatile profile and reasonable profile than husbands. As in social support context, husbands also shows traditionally undemonstrative profile other than wife, and wife shows reasonable profile other than husbands. These finding indicated that husbands and wives were consistent in demonstrating of negativity (such as Low Hostile and Hostile-withdrawn) but different in demonstrating of positivity (such as traditionally undemonstrative profile in husbands, volatile profile and reasonable profile in wives)

Warmly supportive class reported significantly highest levels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hostile withdrawn class reported the lowest levels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consistently cross spouses and contexts. Wives' low hostility wa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low marital satisfaction of husbands. However, husbands' low hostility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wives' marital satisfaction. Although wives who were in volatile class and reasonable class have not demonstrated typical warmly emotional expression, their husbands reported the highest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the group.

On the whole, wives show more emotional intensity than their husbands in both contexts, and husbands are more unexpressive and more warmly supportive in problem-solving and social support contexts for each. Furthermore, husbands' and wives' interactive styles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to their partners'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certain ways.

We speculated three suggestions to couple relationship intervention after the COVID-19 epidemic: (a) Couple education and couple therapy need to be differentiated based on different interactive types of a couple, (b) Couple intervention need to focus on training of "problem-solving" skill, (c) Clinicians need to take consider of sex difference in an interactive model of husbands and wives and motivated husbands involvement in the intervention..

**Key words** interactive profile, marital quality, couple intervention, COVID-19 epidemic